



追寻稳健宪政： 民国法律家张耀曾的法政世界

董彦斌 著



追寻稳健宪政： 民国法律家张耀曾的法政世界

董彦斌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寻稳健宪政:民国法律家张耀曾的法政世界 / 董彦斌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

(法意)

ISBN 978-7-302-30486-9

I. ①追… II. ①董… III. ①张耀曾(1885—1938)—人物研究
IV. ①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256 号

责任编辑:李文彬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宋玉莲

责任印制:李红英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刷 者: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装 订 者:三河市新茂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mm×230mm 印 张:24.75 字 数:389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产品编号:047548-01

目 录

引语	1
第一章 留日习法	7
第一节 清末的“新青年”	7
一、儒学少年	7
二、由旧而新:就读北京第一所新式学校	9
三、“修律元年”的京师大学堂	11
四、在京师大学堂	13
五、拒俄风潮:20 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学生运动	17
六、再次趋新:留日的筹划	19
第二节 东京的法科留学生	21
一、在东京一高:公派留学生的使命	21
二、留日学生总况	24
三、同盟会里的稳健派	26
四、“取缔规则事件”:一次激进与温和的对垒	28
五、从《云南》杂志看张耀曾的中间立场	31
六、受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	38
本章小结	43
第二章 议院立法	45
第一节 参议院参议员	45
一、在南京:共和政权的首批议员	45

二、观察《临时约法》的三条线索	57
三、《临时约法》的制宪权审视	61
四、审查“弹劾吕志伊违法案”	67
五、在北京：参议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69
六、议员张耀曾与总统袁世凯对话内阁模式	75
七、政党政治的展开：要不要以宪政模式思考同盟会	78
八、同盟会如何适应政党竞争的需求	82
九、在政党竞争的思路下打造国民党	84
第二节 国会议员与“天坛宪草”主要起草人	88
一、第一届国会议员	88
二、宋教仁案的宪政影响与宪政隐喻	91
三、威权与政治风波激荡下的国会命运	94
四、国会的解散与议员的逃遁	100
五、“天坛宪草”的缔造者	104
六、“天坛宪草”的制宪权之争	107
七、起草“天坛宪草”	113
本章小结	145
第三章 司法总长	147
第一节 出任司法总长	147
一、护国战争前后：非战主义者为什么介入战争？	147
二、出掌司法部	155
三、张耀曾之前的历届司法总长及其主张	160
四、司法的乐观面与悲观面	166
第二节 召集司法会议	176
一、法界的第二次大集结	176
二、如何向民众传授法律知识？	181
三、“县知事兼理司法”的理论与制度缘起	183
四、张耀曾推动改变“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	184
五、改良全国监狱	190
第三节 许世英案始末	194
一、杨绛女士误读许世英案	194

二、在宋教仁案与江苏司法改革的交织中:1913 年许世英与杨荫杭的冲突	198
三、“二次革命”中的许世英与杨荫杭	202
四、1917 年,杨荫杭拘传许世英	204
五、两种法治观:张耀曾对杨荫杭的惩戒与杨荫杭的申辩	205
第四节 政学会首领	211
一、欧事研究会与民宪党:政学会的两个渊源	211
二、孙中山的大党整合主义与政学会的成立	216
三、引领政学会	223
四、对德宣战与司法总长张耀曾的辞职	225
五、孙中山为什么“护法”?	228
六、从再次任教北大,到参与护法运动	232
本章小结	240
第四章 讨论法权	241
第一节 军阀年代的宪政主义者	241
一、在联省自治运动中	241
二、发起“中华联治党”	245
三、以华盛顿会议制约日本	247
四、第二次出掌司法部	250
第二节 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	254
一、出掌法权讨论委员会	254
二、重组政学会	260
三、第三次出掌司法部,修改清帝逊位条件	263
本章小结	268
第五章 上海律师	269
第一节 以律师为业	269
一、张耀曾律师事务所	269
二、董康侄子的离婚案	275
三、宝山路惨案中为警察辩护	277
四、为新疆省主席金树仁做刑事辩护	282

五、在“七君子案”中营救沈钧儒	294
六、在上海从事法学教育	302
第二节 抗战中的宪政坚持	306
一、求宪政：抗战中的第三种声音	306
二、国难救济会	308
三、“内抗专政”	310
四、“外抵日寇”	315
五、创办《国难半月刊》	319
六、国难会议	322
七、与黄郛合组新中国建设学会	331
八、出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	338
本章小结	341
第六章 学思之获	342
第一节 人文思考	342
一、两代人的家国与个体观念：梁济和张耀曾的比较	342
二、思考宇宙、社会与人生	348
第二节 法政理念	355
一、法律理念	355
二、政治理念	360
本章小结	369
结语	370
参考文献	377

引 语

在“天坛宪草”起草中发挥主要作用并三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是民国时期颇受瞩目的法律人物和政治人物。有三个有趣的历史细节是：在他担任司法总长时，1949 年后的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是他的秘书；他晚年到上海担任律师时，是“张耀曾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沈钧儒则是该所律师；梁漱溟先生也曾在司法部担任他的秘书。

1912 年自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归国后，张耀曾历经立法者、制宪者、司法行政最高长官、收回治外法权的机构负责人、律师等身份，历经各个法律职业。他是一位法政观念人物，但更是一位法政行动人物。本书将具体而细微地展现张耀曾作为宪政推动者的背景、处境和作为，从历史情境中研析其言论与行动，考察其在具体情境（大背景与具体条件）中做出的一个个理性选择。在此基础上，本书通过张耀曾反观民初法律与政治的整体生态，爬梳民初法律与政治演变的过程；通过张耀曾分析民国时期的稳健派，探析其温和改良的政治理念与折衷求全的行动风格；通过张耀曾来观察法律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并探索中国宪政与司法独立的早期历史及其经验教训。

张耀曾是京师大学堂 1902 年恢复招生后招收的第一批学生，^①次年被管学大臣张百熙送往日本留学，历经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习法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任呼吁云南变革的《云南》杂志总编辑。1912 年年初受云南都督蔡锷之邀，任参议院议员，是《国会组织法》起草人，并任同盟会评议部议长。1912 年春夏之交参议院迁北京后，曾被提名为参议院议长，竞选失利，当选参议院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负责法律的起草和审查。此时期他配合宋教仁推动同盟会与其他政党合并为国民党，并任政事研究会主任干事。1913

^① 本部分所指张耀曾各事、各职务，均见本书各章中的讨论，此处为概说，故不另注释。

年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当选众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为“天坛宪草”主要起草人。同年冬他避难日本，次年归国任教于北京大学法科。1916年参与护国战争，任云南军都督府参议，同年夏天他出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并与李根源、谷鍾秀等共同创办有一定影响力的政学会，次年夏天辞司法总长职务，后复任教于北京大学法科。此后两次短暂出任司法总长，1922年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赴上海做律师，与李肇甫、沈钧儒等创办张耀曾律师事务所，直至1938年去世。律师期间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国难救济会、新中国建设学会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也是营救救国会“七君子”的主要牵头人。他与毛泽东、胡适、梁漱溟、沈钧儒、蒋梦麟等被南京国民政府遴选为国防参议会16名参议员之一。

在张耀曾的身边，则是一帧法政人物的群像图。他与民国时期法律、政治、文化领域的诸多重要人物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与联系。

(1) 法律人物。他与伍廷芳同期在内阁任职，在司法方面有共同理念；他与王宠惠曾共同任教于北京大学法科，分任政治学研究所、宪法学研究所负责人，并继王宠惠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他曾聘任沈钧儒为司法部秘书，与沈钧儒合组律师事务所；他与董康都是曾任司法总长的上海律师，并受董康之托代理董康之侄涉案的“江氏案”；他与徐谦同时任司法部总长和次长；他与法律家杨荫杭则因法律家“许世英案”而起矛盾。

(2) 政治人物。他与国民党领袖黄兴是欧事研究会的同志，助宋教仁合组国民党；他为北京政府领导人黎元洪论证继任总统的合宪性；他与云南籍政治人物唐继尧、李根源、吕志伊有较多合作，在护国、护法战争时都受唐继尧之托赴日借款，与李根源、吕志伊等同为早期同盟会云南支部成员，创《云南》杂志，与李根源共同参与了欧事研究会，共同创立了政学会；他与民国初年的议长吴景濂和著名议员谷鍾秀是京师大学堂同学，后为国会中的政治合作伙伴，既共事国会，又共同担当国民党总部事务。与谷鍾秀在段祺瑞内阁同进退，在政学会共同发挥影响力；他晚年与黄郛、黄炎培结为挚友，与国民党要员杨永泰、张群多有往来；他与岑春煊、范源濂、章士钊、张继、邹鲁、范熙壬、李肇甫等皆为良友。此外，他与梁漱溟、郑天挺是情谊深厚、交往密切的亲属，又与胡适、张元济、蔡元培来往颇多。基于这帧群像图，本书便不仅读解张耀曾一人，亦读解他从属

于的不同政团、政党,读解政团、政党决策和法律、政治行动的过程,读解他们的分歧与合力。

张耀曾的理念与行动能启发当代的宪政事业。就政治立场而言,张耀曾是国民党稳健派,不同于国民党激进派,不同于保守主义观念较为强烈的民初共和党、进步党等势力,不同于政治威权人物袁世凯与地方军阀们,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和新文化运动派,不同于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分析国民党稳健派的政治理念,有助于重审民国宪政史,并从中汲取宪政智慧。他求宪政,倡导稳健改革和“良政治”,反对激进行动。(1)在政党方面,他赞成同盟会改组,将同盟会的性质从秘密会党改变为公开政党;他推动民国初年的国民党合组;他创立有影响力的政党政学会,倡导恬静主义。(2)在宪法主张方面,他主张扩大国会权力,主张以责任内阁制衡总统权力;他笃信宪法的力量,推动和参与优良宪法的制定。(3)在推动司法建设方面,他倡导司法独立,力图改变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他主导收回治外法权,向域外展现中国司法建设的成就并促进国内司法改良;他以捍卫人权和促进公正为律师执业准则,参与“金树仁案”、“七君子案”等要案。张耀曾的这些行动与理念,颇有助于当代的宪政与法治建设。与张耀曾的时代相比,当代的宪政建设与司法改革亦是再次出发,于是,张耀曾之失败,吾人可引为戒;张耀曾之执著,吾人可引为范;张耀曾之建树,吾人可引为借鉴。

本书所用材料,除研究性作品外,多为档案史料、当事人文集、书信、日记与清末民国报刊。^①“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丛刊”、“近代史资料”、“文史资料选编”、“革命文献”(台北)皆为大型或连续的档案或回忆出版物,本书各相关部分往往有从中参考之处。本书亦参考了云南省档案馆档案。

第一章,本书用《北京大学史料》、《京师大学堂资料汇编》、《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云南》杂志、《新译界》杂志、《民报》、《大公报》相关部分、《云南杂志选辑》、《辛亥革命亲历记》、《北洋军阀史料·徐世昌卷》、章宗祥《任阙斋主人自述》、吕志伊《天民回忆录》、《吴景濂自述

① 本部分所论著作与文章的版本情况皆见本书文末的参考文献部分。

年谱》、周鍾岳《惺庵回顾录》、《雪生年录》（李根源回忆）、京师大学堂及其留日学生的多篇回忆文章、《梁漱溟全集》、《宋教仁日记》、《宋教仁集》、《杨度集》、《梁巨川遗书》等，讨论张耀曾的求学生涯。前半部分探讨他在北京第一所新式学校东文学社与京师大学堂师从中岛裁之、服部宇之吉等著名日本学者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后半部分观察他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法科和东京帝国大学法科8年留学的经历，并讨论他在东京接受法学教育的具体情形。求学期间，他在东京入同盟会，任《云南》杂志总编辑。《云南》虽隶属同盟会，相较《民报》却有稳健之风。本章由此入手，探析张耀曾稳健理念的形成。

第二章，本书用《参议院议事录》、《参议院议决案汇编》、《参议院会议速记录》、《临时政府公报》、《政府公报》、《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速记录》、史料集《北洋军阀：1912—1928》、史料集《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孙中山藏档选编》《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黄远生遗著》、《宪法新闻》杂志、《东方杂志》、《庸言》杂志、《论衡》杂志、《正谊》杂志、《民立报》、《蔡松坡集》、《梁启超年谱长编》、《岑春煊文集》、李根源《曲石文录新编》、《张国淦文集》、《黄兴集》、邹鲁《回顾录》、《莫理逊书信集》、韩玉辰、王绍鏊等议员或其他当事人的回忆等，讨论张耀曾的议员年代。前半部分探讨他出任参议院参议员和法制委员会委员长起草《国会组织法》、《议员选举法》等重要法律及审议《临时约法》的经历，并从政府和国会关系的角度探讨《临时约法》的渊源与核心条款。后半部分探讨他出任众议院议员、全院委员长、宪法起草委员会重要成员，起草“天坛宪草”的经历。本章对他作为稳健派议员的行动作了分析。他处在威权人物和激进派之间，尽管被袁世凯视为国会议员掣肘政府的代表，仍力求折衷解决之道。本章也研判他作为国民党宪政化推动者的政党行动，从他担任同盟会评议部议长、协助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倡导两党制的一系列举措中，观察国民党稳健派反对激进的话语和实践。

第三章，本书用《政府公报》、《司法公报》、《会泽首义文牍》、《唐继尧护国讨袁文选》、岑春煊《乐斋漫笔》、《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华新报》、《亚细亚日报》、《东方杂志》、由云龙《护国史稿》、《云南护国回忆录》、《姜亮夫全集》述护国军部分、《北洋军阀史料·黎元洪卷》、

《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王宠惠法学文集》、《江庸法学文集》、《伍廷芳集》、《中华新报》、《亚细亚日报》、《东方杂志》、《庸言》杂志、由云龙《护国史稿》、《云南护国回忆录》、《姜亮夫全集》述护国军部分、《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蒋永敬《政事研究会的由来和活动》、章士钊《政事研究会拾遗》、李根源《我与政学会》、韩玉辰《政学会的政治活动》、张国淦《北洋述闻》、孙中山 1916 年信函、林森 1916 年信函、日本驻华军官 1916 年函电以及上海《中华新报》等，讨论张耀曾在司法总长任上前后的作为。考察他任总长前在北京大学法科任教和参加护国战争的过程，考证出他并未担任北京大学法科学长，考证出他在日本为云南护国军借款购械的行动。重点分析他任总长后改良司法的全面努力，并聚焦司法会议和“许世英案”，研究县知事兼理司法制度的变革过程，展现当时司法界的复杂生态。这一时期，张耀曾与李根源等发起成立政学会，倡导恬静、稳健、改良的政治理念。本章在孙中山 1916 年秋冬的“组合大党”背景之下观察张耀曾和政学会，对政学会成立给出区别于以往研究的结论。本章也考察张耀曾在护法战争初期不为研究者注意的深度介入。

第四章，本书用《云南》杂志、《晨报》（北京）、《中华新报》、《民国日报》、《东方杂志》、《华字日报》（香港）、《学林》杂志、《考查司法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法律评论》、《法律周刊》、《胡适来往书信选》、《太平洋会议与梁士诒》、《颜惠庆日记》、《胡适日记全编》、《新编曲石文录》等，讨论张耀曾担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前后的作为。先讨论张耀曾在军阀年代的宪政取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积极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呼吁制定省宪，并参与云南地方自治，筹建中华联治党；在中央政治层面，崇法护宪，有限度支持直系首领吴佩孚“法统重光”的主张，撰宪法文章论证黎元洪续任总统的合法性。后讨论张耀曾专任法权委员会委员长时的作为：推动收回治外法权，促进国内司法改良。

第五章，本书用《清末民国司法行政史料辑要》、《上海律师公会报告书》、《时报》、《妇女生活》、《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进报》、《红旗周刊》、《复兴月刊》、《新疆风暴七十年》、《国难半月刊》、《中华新报》、《国难会议记录》、李璜《学钝室回忆录》、《黄炎培日记》、

《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亦云回忆》等，讨论张耀曾在上海任律师之作为，并观察其作为宪政主义者在日本大敌当前时的表现。在阐述他的律师活动时，既关注他执业律师的基本状况，也锁定他代理的“江氏案”、“宝山路案”、“金树仁案”和“七君子案”，解读案件本身和他本案的执业理念。在阐述他抗战期间的宪政表现时，以他发起或参与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新中国建设学会、国难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为线索，具体分析和展现他吁求民权、反对国民党专政的立场。

第六章讨论张耀曾的人文思考和法政理念。在人文思考部分，对比张耀曾、梁济、梁漱溟，分析清末与民国精英不同的思想世界，并较为系统地阐述张耀曾的人文观：从宇宙本体出发，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入手，崇尚性灵。在法政理念部分，展现张耀曾尊崇宪法、面对现实、保持底线、进行变通的宪政思路，展现他坚持司法独立的信念；展现他作为稳健派，倡导“良政治”，反对激进和急进的不变原则。

第一章 留日习法

第一节 清末的“新青年”

一、儒学少年

张耀曾，字谿西，^①1885年7月21日生于北京。其父张士鏞与其祖父张其仁，一为光绪进士^②，一为道光进士^③。张士鏞是云南大理人，亦生于大理，其家族乃是大理望族，以是，张耀曾虽然生于北京（1885），按籍贯却是云南大理人，这就为他后来参加东京的云南同乡会、出任辛亥革命后云南所派中央参议员奠定了基础，牵出一系列他与云南的渊源。

张其仁曾先后在四川、安徽、湖南、云南^④等地任职，张士鏞则主要是做京官，“在阁二十三年，由中书特典籍委署侍读，兼任国史馆校对、文渊阁校理”^⑤，这使得张耀曾少时的成长与受教育经历，一直在北京完成，故能较便捷地掌握资讯，与亲友中才俊之士交往也较多。张耀曾少时之受教育，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自己家中，由父亲授课；后一阶段，就读于北京东文学社，这是日本人办的一所学校。

张家是儒学世家，张其仁著有《静山先生集》^⑥，“有醇粹乎儒家正

① 亦字蓉溪、蓉西、庸希。

② 张士鏞的同科进士中有曾在刑部工作18年的沈曾植。沈作为张耀曾的父执辈，与张同为法律人而其学所本不同，盖一旧一新，这旧新之交替，恰好是本书关注对比之处。

③ 张耀曾：《先祖事略》，载《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81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④ 同上书，82页。

⑤ 张耀曾：《先考励吾府君先妣陆太夫人行状》，载《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3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⑥ 姚佐绶等编：《中国近代史文献必备书目（1840—1919）》，4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6。

传”^①，张士鏞则在国史馆兼任职务，“同光诸名臣传多出手订”^②，家中自然是一派儒学氛围。张耀曾从五岁开始，接受父亲的家庭教育，直到十六岁。但其间，张耀曾觉得读经甚苦，张士鏞便表现出了较大宽容：“耀曾五岁，府君教之读，督课甚勤，然惟顺性诱导，决不拘一格。初课经书，耀曾以为苦而好杂览群籍，府君乃令半日读经，别购历史、方舆、历算、诗文集等书，令以余晷恣览之。”^③到张耀曾十二岁时，乃是1896年、1897年，此时《马关条约》已签，京师为之震动，维新呼声迭起，少年耀曾虽未接触到时务资讯，其父亲作为内阁文书官员，当然了悉。此时，耀曾益发为传统儒学教育所苦，其父更加宽容：“十二岁时，府君课以制艺，并令试作，耀曾又以为苦，即令弃之，不复课。”^④逐渐地，当时务资讯从天津辗转传布到少年这里并引起极大兴趣时，他的父亲进一步放松了传统教育，而放容耀曾购买新潮报纸。可以说，在家庭教育后期，张士鏞已经完全放手了。“戊戌前一年，都下谈时务者犹少，亲友某自天津归，携某日报数纸，耀曾读之，爱不释手，府君即令购数年无间。自是读书，悉令自择，府君惟数月一课策论而已。”^⑤这种完全放手，使得张耀曾思想不受限制于传统儒学教育，而视野开阔，吸纳西学。但是，在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历史情境里，张士鏞能尊重其子选择，又确有勇气。我们还应看到，张士鏞在教育上的放手，既是时务使然，也与其亲友环境有关。来往极为密切的亲戚梁济，后来对其子梁漱溟的教育，尤为放松放手，梁漱溟说：“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又且同样家世的人所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⑥像张士鏞与梁济这样的内阁文官，作为旧人与新人的承启一代，他们思想中有恋旧的一面，却亦宽容地放任子女吸纳西学、新学。

① 张耀曾：《静山先生集跋》，载《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8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②③④⑤ 张耀曾：《先考励吾府君先妣陆太夫人行状》，载《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3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⑥ 梁漱溟：《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载梁漱溟：《忆旧谈往录》，4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二、由旧而新:就读北京第一所新式学校

1901年年初^①,京师东文学社张榜开学,张耀曾告别家庭教育,开始在外接受西式学校教育。东文学社是北京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后来也被称为“日本人在中国所设立最出色的学校”。^② 学校创立者中岛裁之 1891 年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十四省,曾参加东亚同文会。^③ 他热爱中国,^④ 试图推进中日文化交流。1898 年,中岛裁之任教于保定莲池书院,以流利的中文,为学生讲授日文与英文课程,并拜书院山长、曾国藩的门人、李鸿章极为欣赏的学者、严复的好友、前冀州知州吴汝伦为师。张耀曾后来在京师大学堂的同学,以及更后来的政治合作者谷鍾秀,正曾经是莲池书院的学生,而吴汝伦,在张耀曾进入京师大学堂那一年,亦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详见后文)。谷鍾秀回忆 1898 年的吴汝伦:“戊戌八月,政变于廷……余以梗识,不理于群,先生一言,如丝解棼”^⑤,这正是中岛裁之任教之时;鍾秀又称赞吴汝伦主管的莲池书院“盛矣时髦”,“聘师方外,以傅以咻”^⑥,这也都包含了对中岛裁之的夸奖。后来中岛裁之回国,于 1901 年年初来到北京,拜访吴汝伦,一拍即合,决定在北京开设一所新式学校:东文学社。他们起草的《创立东文学社章程》写道:“欲求振刷中国,非整顿教育不可,今同志之士,议定设东文学社。”这些“同志之士”,包括户部郎中廉泉、刘鹗、王仪郑等。^⑦ 学校资助者为学校提供了创始经费。除一些日本人资助外,尚有刘鹗资助 1000 元,袁世凯资助 3000 元,盐

① 张耀曾称“庚子年冬”,是阴历与阳历的差别。见张耀曾:《先考励吾府君先妣陆太夫人行状》,33 页,载《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②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66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③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84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④ 其墓志铭即为:“一个热爱中国,志大才疏的人”,见[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87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⑤ 谷鍾秀:《祭桐城先生文》,载《吴汝伦全集》第 4 卷,1164 页,合肥,黄山书社,2002。

⑥ 同上。

⑦ 董守义、袁闻琨编译:《日本与中国近代教育》,13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运使杨宗濂受李鸿章之命每月捐助 100 两。^① 1901 年 3 月，即行开学。学校招生条件，极为宽泛，只有两条：一是基本上能读能写；二是身体健康，不食鸦片。第一所新式学校，加上这种宽松的招生条件，又加上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支持，自然报名者众，第一批预定招收 30 名学生，一周报名的就达到 180 人。且学生来源不拘一格，既有翰林，也有布衣和小学生。^②

既是新式学校，课程自是不同。学校按照学生年龄与经历的不同，分为面向成人的专门班（主要培养日语翻译能力）和面向少年的普通班。少年张耀曾上的必是普通班，其课程有日语，也有历史、地理等。先后有 56 名日本人在学校任教。^③ 虽然后来由于经费不济以及中岛裁之健康的原因，中岛在 1906 年请袁世凯批准后划归直隶学务处，由留日归来的张绪英接管，改名直隶官立中学校并仍于不久后关闭，^④ 但毕竟它开了北京新式学校的风气之先，在开办之初受到欢迎和关注，自属正常。张士鐇能够“亟令”^⑤ 张耀曾入学，既给了张耀曾接受日人新式教育的机会，也再一次显现了他作为一名晚清京官的开放度。

就在张耀曾就读东文学社的第二年，1902 年 6 月^⑥，张士鐇离开人世，将全家托付给“过从甚密，遇事相谋”^⑦、当时在皇史宬就职的梁漱溟父亲梁济。张士鐇去世，四壁萧然，身后无以为殓^⑧，梁济颇为辛

①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66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②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84 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③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67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④ 同上。

⑤ 张耀曾：《先考励吾府君先妣陆太夫人行状》，载《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33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⑥ 梁漱溟：《桂林梁先生遗书》之年谱，载《梁漱溟全集》第 1 卷，575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⑦ 张耀曾：《先考励吾府君先妣陆太夫人行状》，载《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34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⑧ 梁漱溟：《桂林梁先生遗书》之年谱，载《梁漱溟全集》第 1 卷，575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